

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『八五』规划重点项目

# 徽州宋族研究

赵华富 著



安徽大学出版社

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



\* 2 0 9 5 7 1 3 9 1 \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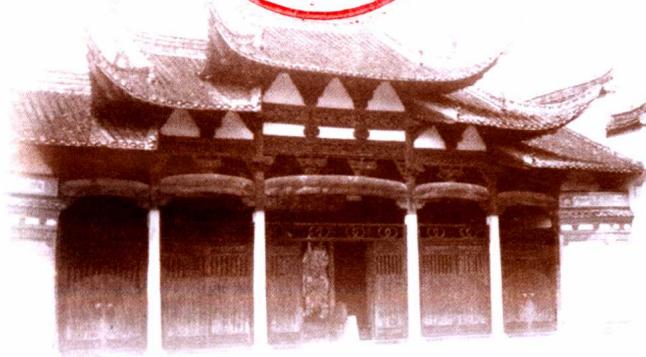
K820.9

Z300

人文社会科学研究「八五」规划重点项目

# 徽州宋桥研究

安徽大学出版社



957139-43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徽州宗族研究/赵华富著. —合肥:安徽大学出版社,  
2004

ISBN 7-81052-802-5

I . 徽... II . 赵... III . 宗族—研究—徽州地区  
IV . K820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16204 号

**徽州宗族研究**

**赵华富 著**

---

出版发行	安徽大学出版社	印 刷	合肥远东印务有限公司
	(合肥市肥西路 3 号 邮编 230039)	开 本	850×1168 1/32
联系 电 话	总编室 0551-5107719	印 张	19.375
	发行部 0551-5107784	字 数	482 千
电子邮箱	ahdxchps@mail.hf.ah.cn	版 次	2004 年 1 月第 1 版
责 任 编辑	朱欣欣 刘 磊	印 次	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封面设计	孟献辉		

---

**ISBN7-81052-802-5/K·60**

**定 价 54.00 元**

如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
此书承蒙  
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  
安徽大学历史系  
旅日爱国华侨张萍女士  
资助出版

# 目 录

写在前面 .....	1
<b>第一章 徽州宗族的兴起 .....</b>	<b>7</b>
第一节 徽州宗族的来源 .....	7
第二节 徽州宗族的形成 .....	26
第三节 徽州宗族的繁衍裂变 .....	45
第四节 徽州宗族繁荣的原因 .....	60
<b>第二章 徽州宗族的组织结构 .....</b>	<b>75</b>
第一节 徽州宗族的统治者 .....	75
第二节 徽州宗族的转型 .....	85
第三节 徽州宗族家庭的经济类型 .....	98
第四节 徽州宗族商人的外迁 .....	127
<b>第三章 徽州宗族祠堂和祖墓 .....</b>	<b>140</b>
第一节 徽州宗族祠堂兴起的时代背景 .....	140
第二节 徽州宗族祠堂的建设 .....	149
第三节 徽州宗族祠堂的规制 .....	164
第四节 徽州宗族祠堂的祭祖活动 .....	175
第五节 徽州宗族的女祠 .....	185
第六节 徽州宗族祠堂对宗族统治的作用 .....	192

第七节	徽州宗族的祖墓和墓祭	197
第八节	徽州宗族祭祖的种类	207
<b>第四章 徽州宗族谱牒</b>		214
第一节	宋元徽州谱牒	214
第二节	明清和民国时期的徽州谱牒	227
第三节	徽州谱牒数量大、善本多的原因	242
第四节	《新安名族志》的编纂宗旨	251
第五节	徽州谱牒资料辨	258
<b>第五章 徽州宗族族产</b>		268
第一节	徽州族产的来源	269
第二节	徽州族田的种类	289
第三节	徽州族产的所有制形式	312
第四节	徽州族产的经营管理	329
<b>第六章 徽州宗族族规家法</b>		362
第一节	族规家法的制定	362
第二节	伦理道德的规范	366
第三节	生活行为的规范	383
第四节	对触犯族规家法者的惩处	401
第五节	“家法大于国法”辨	415
<b>第七章 徽州宗族重教崇文的传统</b>		425
第一节	“十家之村，不废诵读”	425
第二节	科第蝉联与累世簪缨	445
第三节	经学传家	462

<b>第八章</b>	<b>徽州宗族经商的风尚</b>	<b>477</b>
第一节	“业贾者什七八”	477
第二节	“足迹几遍寓内”	483
第三节	“其货无所不居”	488
第四节	“富拟封君”	503
第五节	“虽为贾者，咸近士风”	507
第六节	道光中叶至民国时期的徽州宗族商帮	513
<b>第九章</b>	<b>徽州宗族个案研究</b>	<b>530</b>
第一节	歙县呈坎前后罗氏宗族调查研究	530
第二节	黟县西递明经胡氏宗族的发展和繁荣	566
第三节	民国时期黟县西递明经胡氏宗族 调查研究	588
<b>附录</b>		
	从徽州宗族资料看宗族的基本特征	600
<b>后记</b>		<b>615</b>

## 写在前面

徽学是一门新兴的学术研究领域。20世纪50年代，随着徽州大量契约文书的发现，徽州社会、经济和文化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兴趣，产生了一批重要研究成果。

20世纪90年代以来，安徽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、安徽师范大学、黄山市人民政府等单位合作，先后举办了全国徽学研讨会暨徽学研究与黄山建设关系研究会、首届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、'95国际徽学研讨会、'98国际徽学研讨会；在此期间，笔者主编出版了《首届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文集》（黄山书社1996年版），并与周绍泉先生合编出版了《'95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》（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）、《'98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》（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），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。1999年，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被教育部批准确定为“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”之一，徽学研究受到学术界愈来愈多的关注和重视。

历史文献记载告诉我们，徽州社会、经济和文化的内容异常丰富。我们为什么要重点研究世家大族呢？因为徽州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典型宗族社会。赵吉士在《寄园寄所寄》中说：“新安各姓，聚族而居，绝无一杂姓掺入者，其风最为近古。出入齿让，姓各有宗祠统之。岁时伏腊，一姓村中，千丁皆集，祭用文公《家礼》，彬彬合度。父老尝谓，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：千年之家，不动一抔；千丁之族，未常散处；千载之谱系，丝毫不紊。”徽州社会各个方面

现象——政治、经济、教育、风俗、思想、文化——都与宗族有内在联系。历史文献记载证明,世家大族是徽州历史发展变化的社会土壤。徽州宗族研究是阐明徽州社会发展规律的关键。

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宗族社会。秦汉以来,虽然“封建之制不行,大小宗之法废”,但是,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人群共同体始终存在。宋元以来,徽州宗族特别繁荣,徽州成为中国宗族社会的一个典型地区。共性寓于个性之中。研究徽州宗族,不仅可以揭示徽州宗族产生、繁荣、发展的规律和特征,而且对认识中国宗族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和参考价值。

徽州宗族是一种历史现象,同时,这种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人群共同体又是一种社会现实。因此,研究徽州宗族不但要使用历史学研究法,而且还必须采用社会学研究法。根据徽州宗族这一研究对象,笔者研究徽州宗族采用的方法是:历史文献与社会调查相结合、个案研究与整体研究相结合、专题研究与综合研究相结合。

徽州宗族谱牒异常丰富,它是研究徽州宗族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。现在,国内外各大图书馆、博物馆、档案馆等单位馆藏徽州谱牒总计 1,000 多种。此外,原徽州一府六县民间保存的谱牒,数量也相当可观。在这些谱牒当中,有宋元时期的谱牒 14 种,明代谱牒 200 多种,清代谱牒数量最多。其中,有大量宗族史、社会史、土地制度史、商业史、人口史、移民史、伦理史、文化史资料,是一个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资料库。研究徽州宗族,首先要阅读和研究徽州谱牒。从 1990 年起,笔者即先后在安徽省图书馆、安徽省博物馆、国家图书馆、国家图书馆分馆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、河北大学图书馆、南京图书馆、南京大学图书馆、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、上海图书馆、黄山市博物馆、歙县博物馆、歙县档案馆、黟县档案馆等单位阅读和研究徽州谱牒,摘录资料 200 余万字,抄录族规家法 100 多部。

民主革命时期,徽州宗族制度遭到空前沉重的打击,但是宗族并没有被彻底摧毁。因为,这种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人群共同体,是不能够用政治力量将其完全消灭的。众所周知,现在原徽州地区广大农村的农民多数仍然是聚族而居,许多宗族现象还或多或少地存在。因此,研究徽州宗族不仅要阅读徽州谱牒,而且还必须深入实地进行社会调查。从 1990 年起,笔者每年在徽州农村住一二个月,十年期间,足迹遍布原徽州一府六县——歙县、休宁、黟县、祁门、绩溪、婺源,采访了数以百计的老人,搜集到民间收藏的大量珍贵谱牒、契约文书资料,获得大量在图书馆得不到的口碑资料。“耳听为虚,眼见为实”,“不入虎穴,焉得虎子”。通过实地考察得到了许多在书本中得不到的知识。笔者认为,对徽州宗族进行社会调查,必须要住在农村,与老百姓交朋友,而不是走马观花。近几年,在徽学论著之中,出现的许多道听途说、捕风捉影、张冠李戴、无中生有、信口雌黄等贻笑大方和让徽州人捧腹之说,都与蜻蜓点水式的所谓社会调查和对口碑资料不进行考证有关。

徽州宗族数以千百计,研究徽州宗族应该从何处入手呢?笔者认为,必须首先解剖“麻雀”,进行个案研究。只有一个一个地解剖“麻雀”,才能揭示宗族内部的机制和本质。从 1990 年起,笔者即在徽州选定以下宗族作为重点个案研究对象,进行个案研究。

1. 歙县棠樾鲍氏宗族
2. 歙县呈坎前、后罗氏宗族
3. 休宁月潭朱氏宗族
4. 祁门渚口、伊坑、滩下、花城里倪氏宗族
5. 黠县西递明经胡氏宗族
6. 黠县南屏叶氏宗族
7. 绩溪龙川胡氏宗族
8. 婺源游山董氏宗族

笔者在深入地进行个案研究之后,先后发表了《歙县棠樾鲍氏宗族个案报告》(《江淮论坛》1993年第2期)、《徽州西递明经胡氏宗族的繁盛》(《安徽史学》1994年第4期)、《黟县南屏叶氏宗族调查报告》(《'95安徽大学学术活动月论文选粹》,安徽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)、《民国时期黟县西递明经胡氏宗族调查报告》(《安徽大学学报》1995年第2期)、《歙县呈坎前后罗氏宗族调查研究报告》(《首届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文集》,黄山书社1996年版)、《祁门县渚口、伊坑、滩下、花城里倪氏宗族调查研究报告》(《徽学》2000年卷,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)、《婺源县游山董氏宗族调查研究》(《徽学》第二卷,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)。

笔者认为,研究徽州宗族必须进行个案研究,但是,仅仅进行个案研究还是不够的,那样必然陷入只见树木、不见森林的形而上学观点。徽州宗族既是一些个体,又是一个群体。因此,除了微观研究以外,还必须对徽州宗族进行整体宏观研究。只有这样,才能把握徽州宗族的整体面貌,揭示徽州宗族的基本特征和基本发展规律。所以,笔者在研究了大量谱牒资料和对徽州宗族做了大量调查之后,在个案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,又对徽州宗族进行整体研究,撰写了《从徽州宗族资料看宗族的基本特征》(《谱牒学研究》第4辑,《新华文摘》1995年第12期)。在这篇论文中,笔者从数以百计的徽州宗族之中抽象、概括出宗族的定义和宗族八个基本特征。

为了使徽州宗族研究有一定深度,不停留于一般化,进行专题研究是非常重要的。这好比盖高楼大厦,必须打桩子。桩子打得愈深,基础就愈牢固。否则,就是在沙滩上建大楼,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,这是不言而喻的。笔者除了选择一些典型宗族进行个案研究以外,还对徽州宗族一些问题进行了分门别类的专题研究,并发表了一批文章。《论徽州宗族繁荣的原因》(《民俗研究》1993年第1期)、《论徽州宗族祠堂》(《安徽大学学报》1994年第2期)、《徽州宗族族规家法》(《首届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文集》,黄山书社

1996 年版)、《徽州宗族祠堂的几个问题》(《'95 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》,安徽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)、《徽州宗族祠堂三论》(《安徽大学学报》1998 年第 4 期)、《宋元时期徽州族谱研究》(《元史论丛》第 7 辑)、《徽州族谱数量大和善本多的原因》(《中国谱牒研究——全国谱牒开发与利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版)、《徽州族谱在明代中期的发展变化》(《中华谱牒研究——国际谱牒开发与利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,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)、《明代中期徽州宗族统治的强化》(《'98 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》,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)等论文,就是笔者对徽州宗族进行专题研究的部分成果。这些论文大部分已编入《两驿集》(黄山书社 1999 年版)。

对徽州宗族进行综合研究,是笔者研究工作的最后一步。现在,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《徽州宗族研究》,就是笔者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,进行综合研究的成果。对已经发表的专题研究论文,有的补充了许多资料,有的增补了部分内容,有的做了进一步探讨,有的局部做了调整,有的重新改写。如,《论明清徽州社会的繁荣》(《东南文化》1991 年第 2 期,《新华文摘》1991 年第 11 期)一文中,就对徽州科第仕宦的成就、商业经济的繁荣、精神文化的昌盛、教育事业的发达等,不仅补充了大量材料,而且全部内容做了重新改写;《徽州宗族族规家法》一文,不仅对触犯族规家法者惩处的内容大大增加,而且还增加了一部分“‘家法大于国法’辨”;对《徽州宗族祠堂的几个问题》中“百世不迁”和“五世则迁”以及《徽州宗族祠堂三论》中女祠建造的目的和神主供奉等问题,都做了进一步探讨。

这里还要指出的是,笔者研究徽州宗族有一个从徽州宗族历史到宗族理论,再从宗族理论到徽州宗族历史的研究过程。根据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,笔者在阅读了徽州谱牒,对徽州宗族进行调查,积累了大量资料之后,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之上,撰写了《从徽州

宗族资料看宗族的基本特征》一文。在这篇文章中,笔者提出,宗族是历史上形成的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人群共同体,它有八个基本特征:1.有共同的始祖;2.以血缘关系为纽带;3.有明确的昭穆世次;4.开展一定的集体活动;5.有一定的聚居地点;6.有一定的组织管理形式;7.有宗族的族规家法;8.有集体所有的族有财产。后来,笔者又用上述观点指导自己的徽州宗族研究,撰写了《歙县呈坎前后罗氏宗族调查研究报告》、《祁门县渚口、伊坑、滩下、花城里倪氏宗族调查研究报告》、《婺源县游山董氏宗族调查研究》、《休宁月潭朱氏宗族调查研究报告》(未刊)、《绩溪龙川胡氏宗族调查研究报告》(未刊)、等文章。由于《从徽州宗族资料看宗族的基本特征》不仅是笔者对徽州宗族研究的理论概括,而且又是笔者从事徽州宗族研究的指导思想,所以,将《新华文摘》转载稿略加修改作为附录收编于此书之中。

# 第一章 徽州宗族的兴起

## 第一节 徽州宗族的来源

徽州宗族有两个来源,一个是土著居民——山越人,一个是外来居民——“中原衣冠”。外来居民虽然来自四面八方,但是“中原衣冠”是其主体。因为,除了径直从中原地区迁入徽州的封建仕宦和士大夫以外,在江南地区迁入徽州的居民当中,追本溯源其远祖许多也是“中原衣冠”。

### 一、土著居民——山越

徽州地区最早的土著居民是山越人。何谓山越?胡三省称:“山越本亦越人,依阻山险,不纳王租,故曰山越。”<sup>①</sup>王鸣盛说:“自周秦以来,南蛮总称百越,伏处深山,故名山越。”<sup>②</sup>他们群居于“深林远薮”之中,是“椎髻鸟语之人”。<sup>③</sup>山越人特别引人注目的是:“好为叛乱,难安易动。”<sup>④</sup>

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,把全国分为三十六郡。于徽州地区置

① 《资治通鉴》卷五六,注。

② 王鸣盛:《十七史商榷》卷四二《山越》。

③ 《后汉书》卷三八《度尚传》。

④ 《三国志》卷六〇《贺全吕周钟离传》。

黟、歙二县，属会稽郡。两汉时期，黟、歙归属多次变动，西汉宣帝五凤四年（公元前54年）和东汉光武帝建武六年（公元30年），黟、歙先后最终归属丹阳郡。

在秦汉帝国长达四个多世纪统治之后，山越“犹未尽从”<sup>①</sup>。东汉以来，一再“作乱”。封建王朝与他们进行了长期的斗争。灵帝建宁二年（公元169年），“丹阳山越贼围太守陈夤，夤击破之”<sup>②</sup>。献帝建安五年（公元200年），东汉帝国“分部诸将，镇抚山越，讨不从命”<sup>③</sup>。建安八年（公元203年），孙权“西伐黄祖，破其舟军，惟城未克，而山寇复动”<sup>④</sup>。《三国志》卷五一《孙策传》载：“策领豫州刺史，转丹阳都尉，行征虏将军，讨平山越。”同书卷五四《吕蒙传》载：“（邓）当为孙策将，数讨山越。蒙年十五六，窃随当击贼，当顾见大惊，呵叱不能禁止。”陆逊曾向孙权献平定山越之策。《三国志·陆逊传》记载：

（孙）权以兄策女配逊，数访世务，逊建议曰：“方今英雄慕跱，豺狼窥望，克敌宁乱，非众不济。而山寇旧恶，依阻深地。夫腹心未平，难以图远，可大部伍，取其精锐。”权纳其策，以为帐下右部督。会丹阳贼帅费栈受曹公（按：指曹操——引者）印绶，扇动山越，为作内应，权遣逊讨栈。栈支党多而往兵少，逊乃益施牙幢，分布鼓角，夜潜山谷间，鼓噪而前，应时破散。遂部伍东三郡，强者为兵，羸者补户，得精卒数万人，宿恶荡除，所过肃清，还屯芜湖。

① 《资治通鉴》卷六三。

② 《后汉书》卷八《孝灵帝纪》。

③ 《三国志》卷四七《吴主传》。

④ 《三国志》卷四七《吴主传》。

陆逊认为，山越是孙吴政权的心腹大患。“腹心未平，难以图远”。《三国志·贺全吕周钟离传》评曰：“山越好为叛乱，难安易动，是以孙权不遑外御，卑词魏氏。凡此诸臣，皆克宁内难，绥静邦域者也。”

建安十三年（公元 208 年），孙吴政权开展的一场镇压黟、歙山越的战斗打响了。统帅大军的将领是威武中郎将贺齐。吴军首战告捷，降服武强、叶乡、东阳、丰浦四乡。贺齐“表言以叶乡为始新县”<sup>①</sup>。但是，歙县的山越统帅金奇万户屯安勒山，毛甘万户屯乌聊山；黟县山越统帅陈仆、祖山等二万户盘据林历山，顽强抵抗，拒不归降。史载，“林历山四面壁立，高数十丈，径路危狭，不容刀楯”。山越“临高下石，不可得攻”。吴“军住经日，将吏患之”。贺齐“身出周行，观视形便，阴募轻捷士，为作铁弋，密于险贼所不备处，以弋拓堑为缘道，夜令潜上，乃多县布以援下人，得上数百人，四面流布，俱鸣鼓角，齐勒兵待之”。山越“夜闻鼓声四合，谓大军悉已得上，惊惧惑乱，不知所为，守路备险者，皆走还依众。大军因是得上，大破仆等，其余皆降，凡斩首七千”<sup>②</sup>。贺齐上表“分歙为新定、黎阳、休阳”和歙县四县。孙吴政权遂以歙县、黟县、始新、新定、黎阳、休阳六县割建新都郡，贺齐加偏将军，任太守，立府于始新（今浙江淳安县西）<sup>③</sup>。

建安十三年这场激战，以陈仆、祖山为首的山越被镇压下去

① 《三国志》卷六〇《贺齐传》。

② 《三国志》卷六〇《贺齐传》。

③ 《三国志》卷六〇《贺齐传》。葛洪：《抱朴子内篇》卷五《至理》记载：“昔吴遣贺将军讨山贼，贼中有善禁者，每当交战，官军刀剑皆不得拔，弓弩射矢皆还向，辄致不利。贺将军长智有才思，乃曰：‘吾闻金有刃者可禁，虫有毒者可禁，其无刃之物，无毒之虫，则不可禁。彼能禁吾兵者，必不能禁无刃物矣。’乃多作劲木白棒，选异力精卒五千人为先登，尽捉棓。彼山贼恃其善禁者，了不能备。于是官军以白棒击之，大破彼贼，禁者果不复行，所打煞者，乃有万计。”

了。《三国志·蒋钦传》说：“贺齐讨黟贼，钦督万兵，与齐并力，黟贼平定。”但是，山越并没有屈服统治者的武力征服，他们仍顽强地进行反抗斗争，时起时伏，时间长达数个世纪。

孙权称帝伊始，山越即举行叛乱。吾粲“募合人众，拜昭义中郎将，与吕岱讨平山越”。因功“入为屯骑校尉、少府，迁太子太傅”。<sup>①</sup>《三国志·诸葛恪传》记载说：“山越恃阻，不宾历世，缓则首鼠，急则狼顾。”

孙吴赤乌年间(公元238~250年)，“建安、鄱阳、新都三郡山民作乱，出(钟离)牧为监军使者，讨平之。贼帅黄乱、常俱等出其部伍，以充兵役”<sup>②</sup>。

孙吴太平二年(公元257年)，“鄱阳、新都民为乱，廷尉丁密、步兵校尉郑胄、将军钟离牧率军讨之”<sup>③</sup>。

梁天监九年(公元510年)夏，“山贼吴承伯破宣城郡，余党散入新安，叛吏鲍叔等与合，攻没黟、歙各县”，并进兵击太守谢览。“览遣郡丞周兴嗣于锦沙立坞，拒战不敌，遂弃郡奔会稽。台军平山寇，览复还郡”。<sup>④</sup>

《陈书》卷三《世祖纪》记载：“山越深险，皆不宾附，世祖分命讨击，悉平之，威惠大振。”

唐贞元年间(公元785~804年)，裴肃为浙东观察使，“剧贼栗锽诱山越为乱，陷州县，肃引州兵破禽之，自记平贼一篇上之，德宗嘉美”<sup>⑤</sup>。

从东汉开始至隋唐时期，大约经过六个世纪的时间，山越才被彻底征服。9世纪以后，历史文献中不但不见山越“叛乱”，而且

<sup>①</sup> 《三国志》卷五七《吾粲传》。

<sup>②</sup> 《三国志》卷六〇《钟离牧传》。

<sup>③</sup> 《三国志》卷四八《三嗣主传》。

<sup>④</sup> 罗愿：《新安志》卷九《谢览传》。

<sup>⑤</sup> 《新唐书》卷一八二《裴休传》。